

# 当“三套集成”遭遇语境研究

## ——兼论文本研究的当下与未来

谭璐

**内容提要：**“三套集成”和文本研究的当下际遇与其实际学术价值不成正比，我们有必要思考后集成时期二者遭受学界冷落的原因，寻找走出困境的途径。语境与文本话题的探讨折射出国际性范式思维的烛照下，学人的坚守与突围。

**关键词：**“三套集成” 文本研究 语境研究

“三套集成”<sup>①</sup>花费了无数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心血。进入“后集成时期”<sup>②</sup>，民间文学界有没有对这一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展开深入探讨？现象背后隐藏着哪些值得挖掘的深意？

### 变脸：后集成时期“三套集成”遭冷遇

笔者分别以“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为主题，以2000年至2012年为时限，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相关文章167篇。具体信息如下表：

表一 后集成时期“三套集成”相关文章数量统计表

年份	三套集成 (16篇)	中国民间故事 集成(129篇)	中国歌谣 集成(6篇)	中国谚语 集成(16篇)	年度文章总量
2000	0	17	1	2	20
2001	2	18	0	4	24
2002	0	16	0	0	16
2003	1	15	0	1	17
2004	2	13	2	4	21
2005	3	6	0	1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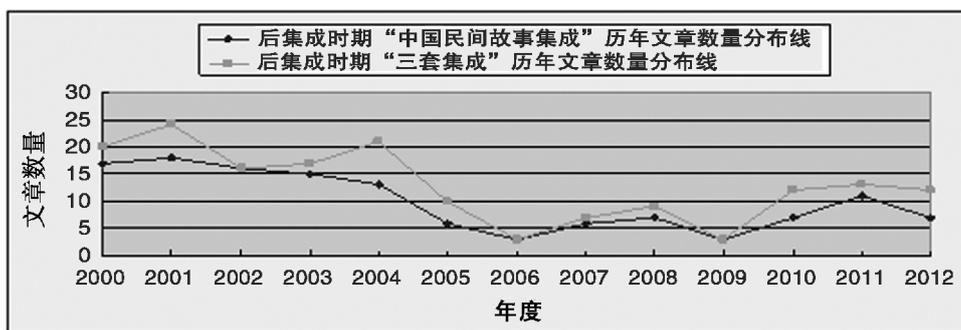
① 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简称。

② 刘锡诚：《关于当前民间文艺的几点思考》，《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

续上表

2006	0	3	0	0	3
2007	1	6	0	0	7
2008	1	7	0	1	9
2009	0	3	0	0	3
2010	2	7	1	2	12
2011	2	11	0	0	13
2012	2	7	2	1	12

图一 后集成时期“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三套集成”历年文章数量分布图



从上述图表可知,后集成时期,学者对“三套集成”的关注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关注度不够。对“三套集成”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后集成时期的前 5 年。表一的数据表明:2000 年至 2004 年 5 年间发表的与故事集成有关的文章数量占 13 年相关文章总量的 53%。图一显示:2004 年之后,学者对“三套集成”的关注明显呈整体下降趋势。第二,关注不均等,对民间故事集成的关注占绝对优势。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为主题的文章达 129 篇,占全部文章总量的 76%。而以“中国歌谣集成”为主题的文章仅占 4%。第三,缺乏对“三套集成”的整体反思与理论探讨。以“三套集成”为主题的文章共计 16 篇,还不足文章总量的 10%。部分年份甚至没有理论文章问世。

此外,学者们对“三套集成”的态度也存在差异。高度肯定“三套集成”的学者主要来自文本研究的学术队伍,且以集成的参与者、老学者为主。作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编委会的成员和湖北卷的副主编,故事学家刘守华如是评价“三套集成”：“其最终成果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经历百年风雨大步迈向成熟的标志。”<sup>①</sup>对“三套集成”的反思更多来自中青年学者。朝戈金认为“三套集成”经过文人染指,其“科学性”值得商榷;与对“三套集成”的意

①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色与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 年第 2 期。

义挖掘相比,学者更应该思考科学、规范的文本如何造作与出笼的问题。<sup>①</sup>万建中认为学界对“三套集成”本真性的质疑有些吹毛求疵:“即便是受过民族志诗学严格训练的记录者,也不可能用他的笔涂写出学者们臆想中的记录文本……因此,对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种种挑剔更多是出于对学术的癖好。”<sup>②</sup>还有部分学者选择对“三套集成”保持沉默。

### 反思:“三套集成”为何成为明日黄花

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三套集成”与文本研究的关系。简言之,文本研究为“三套集成”的编撰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而“三套集成”丰富的文本资源也常常被用于佐证或激发文本研究者的新观点。二者关系密切,因而对“三套集成”遭遇冷落的原因分析同样适用于对文本研究的思考。“三套集成”的现状与出路也正是文本研究的当下与未来。

“三套集成”遭遇冷落首先需要反思自身。它侧重展示的是一个有机整体中的“文本”部分,对传承人、受众、表演情景、传承时空、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活态的、立体的因素少有关注。此外,“三套集成”经由从采录者到县市、地区再到省的层层过滤,部分篇目整理痕迹较重,因而其本真性受到质疑。如果把“三套集成”放在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中来考察,学科研究重心、学者学术取向、学科定位这三方面应该是我们寻找原因的重要维度。

#### (一)民间文学的研究重心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民间文学理论探讨以文本研究为核心。“三套集成”前、中期的工作也主要在文本研究理论指导下展开。随着集成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源集中在少数传承人手中,不同地域民间文学资源分布并不均等。在实地采录经验的触动下,学者逐渐意识到传承人与传承语境的重要性。而表演理论等的译介进一步推动国内学者对语境的研究。此外,上世纪末学科地位的调整,促使民间文学的研究队伍渴求新的理论方法化解学科危机;新世纪的“非遗”保护运动则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文学界“朝向当下”的视角转向。在后集成时期,“语境”“民”“生活世界”等取代了“类型”“母题”“结构”“功能”,民间文学步入了田野民族志式的外部研究时代。外部学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三套集成”不得不面对生在“文本”中,长在“语境”下的尴尬。

#### (二)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取向相异

研究重心的转移和学科地位的调整直接促成民间文学队伍中的部分学者调整研究视角,甚至更换研究领域。他们或果断地选择坚守文本或决然地投入语境,或在文本与语境之

<sup>①</sup> 朝戈金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第十届年会(2013年3月9日)上的讨论发言。

<sup>②</sup> 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价值的认定与把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

间游走,试图另辟蹊径。后集成时期,学者对“三套集成”的态度直接受到自身学术取向的影响。在文本研究者眼中,“三套集成”可作为主体对象;在语境研究者眼中,“三套集成”多作为佐证观点的次要维度。从学科取向的层面来分析,有人重视有人忽视“三套集成”的价值这一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 (三)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学科定位混同

“三套集成”与文本研究遭遇冷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定位不明确。从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两个学科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来看,二者相互影响深远。民间文学创立之初就存在“文艺”还是“学术”的定位纠葛。时至今日,行走了近百年的两个学科,其关系仍旧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这种密切的关系促进了二者的发展。上世纪末,民俗学界致力于向“语境研究、生活研究、整体(事件)研究”<sup>①</sup>转型。受此影响,民间文学界也开始反思文化、文本、向后看的学术传统;建构生活世界、语境、朝向当下的学术观念。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立体描写”、“整体研究”……种种理论被引进、提出、应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另一方面,两个学科过于密切的关系,也导致了民间文艺学学科定位模糊的弊端。近三十年来,民俗学界正逐步实践着社会科学化转型的构想:“从侧重文本分析转向通过民俗理解当下的社会与人,分析社会变化与传统的传承之间的关系,分析日常生活细节与国家共同体的文化建构关系。”<sup>②</sup>而部分民间文学研究者忽略了“民间文艺学属于文学领域,特殊并不意味着偏离,它的基本特性为文学性,只有以其为基点,才能构建起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sup>③</sup>这一根本前提,与自身的学科定位渐行渐远。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是两个既联系紧密又界限分明的学科。民间文艺学只有不偏离学科本位,方能避免再次“被边缘化乃至于涵化”<sup>④</sup>的危险。如果连民间文艺学队伍中的人都轻视文本,那么“三套集成”遭遇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 突围:文本研究何去何从

原因揭示是前提,问题解决是根本。集成研究、文本研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 (一)正确看待“三套集成”以及文本研究的价值

后集成时期,语境研究者青睐立体的、活态的、原生性的文本。相比之下,集成文本平面化的呈现方式、非活态的书写以及整理性的资料处理方法有诸多不足,但理性分析,“三套集成”与新的学术生态环境存在“磨”而“合”之的可能。一方面,“三套集成”具有与新理论对话

① 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③ 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

④ 陈建宪:《走向田野 回归文本——中国神话学理论建设反思之一》,《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的基础。“它基本上不收录现成书面资料,要求所有作品及相关资料均从田野调查中采录得来。”<sup>①</sup>在有限条件下,集成文本不仅记录了采录时间、地点、采录者和讲述人的简要信息,必要处还列出了异文,对方言土语和有关风俗作了注释、附记。可见,集成文本的采录同样讲求活态性,也具有记录语境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语境研究热潮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三套集成”的推助。在集成文本采录的过程中,大批优秀传承人浮出了水面。学者很快发现了传承人的价值进而产生了追踪研究的兴趣,最终将目光聚焦到“人”与“境”上。而对“人”与“境”的关注正是后集成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重点所在。从上述分析可知,“三套集成”与学术新环境并不违背,具备开发学术价值的潜能。

此外,文本研究对于完善现有学科框架和建构学科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曾经,文本研究独领风骚;今天,语境研究势头强劲。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态势背后却暴露出同质的思维缺陷:更多对立与二分,少有对话与合作。问题的关键就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提出对“三套集成”与文本研究价值的再挖掘,可以一定程度改观目前民间文学理论界语境研究过热的现状,部分地纠正方法论追寻上非此即彼的思维偏颇,为未来民间文学学科建构提供更多可以借鉴的理论方法,让文本与语境在合作与互补中保持适度的张力而非过度的离心力。

## (二)积极改观文本研究的现状

首先,研究者应有坚持文本研究的信心。在中外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文本研究是公认的经典的内部研究方法。它以文本为研究对象,因而对开掘“三套集成”这一文本资源库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当今的民间文学界,研究“语境中的文本”是个不错的思路。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变成了研究“文本中的语境”,存在偏离本体之嫌。这一现象导致的不良后果也引起了语境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坦言:“由于过度强调对以文本为中心的视角的矫正,结果导致了重视外部的语境研究而轻视内部的文本或民俗事象内在属性分析的倾向。”<sup>②</sup>需知,内部研究充分与否是学科能否自立生存的重要依据。文本研究的学术史贡献以及来自学术前沿的反思足以证明:在民间文艺学领域,文本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研究者应积极促成文本研究与其他方法的对话,以此来拓宽文本研究的发展空间。文本研究与语境研究之间并非截然二分的对立关系。“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文本与语境,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指向的都是人,并不矛盾。”<sup>③</sup>展开对话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互为参照反观内省。文本研究者需检讨长期对语境因素的忽略,坦承语境研究的必要性。同理,语

①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色与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

② 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③ 丁晓辉:《荒谬与合理:民间叙事的文本、语境与叙事逻辑》,《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

境研究者也应冷静反观自身缺陷,进而追问我们的研究在回应主流学术话语之时,有没有丧失民间文学的主体性?在反观内省的基础上纠正已有不足,将文本研究融入到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才是文本研究的真正出路。

最后,研究者应积极建构“多向度”的学术园地,将“三套集成”以及文本研究的价值挖掘放在“复调”式的学术空间中进行。一方面,一个真正成熟的学科会拒绝“单向度”,倡导多种理论方法的共存。撑起民间文学学科的天空需鳌之四足。所以,在打造新的“鳌足”之前,“文本研究”之足不可斩断。掰一个掉一个的做法看似在解决问题实则加剧学科危机。另一方面,应该把同一探讨对象放在立体维度中来考查,鼓励多重研究视角的共存,构建“复调”式的学术空间。比如,在“多向度”和“复调”式的思维理念之下,学界对“三套集成”本真性的评价出现差异实属正常。本真性只是一种相对的存在,研究目的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尽相同。学者们习惯于从各自偏重的某一向度、某一层面来看待本真性。当多尔逊对伪民俗嗤之以鼻,欲除之而后快之时,邓迪斯却认为伪民俗也有存在理由和研究价值。更何况,本着“三性”原则的“三套集成”并非伪民俗也!唯有在“多向度”的学科空间构架中,学者选择方向时才不会跟着潮流走,而是沿着意义行。唯有在“复调”式的学术理念关照下,“三套集成”和文本研究才能进入更多学者的研究视野,才有机会真正迎来“集成研究”的盛况。

### (三)努力开拓文本研究的未来

国内外部分有开拓性和使命感的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对于我们发掘“三套集成”的价值,创新文本研究的方法不无启示。已故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对文本研究的未来趋势做过探寻。他将比较研究、结构研究与精神分析法相结合,从民间叙事文本中寻找象征对等。该思路让大量的文本被重新赋予了学术意义。<sup>①</sup>邓迪斯的研究充分表明:不是文本缺乏价值,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本世纪初,陈建宪认为只有坚持内部研究、坚持文本批评方法为主,民间文艺学才能避免学科独立性被消解的命运。“走向田野,回归文本”<sup>②</sup>的观念启迪我们:既然研究最终会“回归文本”,作为国内乃至世界上资料最丰富的民间文学文本库,“三套集成”的价值就应得到充分发挥。高丙中提出“激活学科传统”的主张,吕微、户晓辉将其实践到对“母题”等民间文学经典概念的解读上。<sup>③</sup>对经典概念的深度阐释,以及对传统文本研究方式的改良、革新都是文本研究的未来方向之一。近年来,杨利慧反思语境的“效度”与“限

<sup>①</sup> Alan Dundes, “The Symbolic Equivalence of Allomotifs in the Rabbit-Herd”, *Parsing through Customs: Essays by a Freudian Folklorist*,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167-177.

<sup>②</sup> 陈建宪:《走向田野 回归文本——中国神话学理论建设反思之一》,《民俗研究》2003 年第 4 期。

<sup>③</sup> 吕微、高丙中、朝戈金、户晓辉:《母题和功能:学科经典概念与新的理论可能性》,《民间文化论坛》2007 年第 1 期。

度”,基于“没有一种理论视角是万能的”的观念,提出并初步实践了“综合研究法”<sup>①</sup>。“综合研究法”的提出体现了研究者对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试图对话与走向整合。无论是从方法论上将结构对等推进到象征对等,还是从本体论出发坚守文本研究的立场;无论是“激活”文本研究的经典概念还是将文本与语境加以整合……国内外学者都在为提升学科自我建构的能力而努力突破。他们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后集成时期,文本研究黯然之际,我们更多的不应是退缩甚至放弃,而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库,努力开拓文本研究的未来。

范式的革新通常建立在对原有范式的反思之上:将原有范式忽视的加以凸显,重视的加以批判,遗忘的加以补充。而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只能在一段时期占据学术史的中心地位。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尝试对文本研究作出种种反方向突围,并成功使得语境研究成为民间文学学术中心。时至今日,具有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是否也到了再次突围的时候了?不如此,语境研究是否也“可能会沦为学匠式的重复劳动”<sup>②</sup>?民间文学在“借助‘轻视’学科传统”<sup>③</sup>带来开放之后,是否到了回归对学科内部传统经典的认同和开掘的时候了?今天,当我们仍旧被深重的学科危机意识包裹之时,“三套集成”以及文本研究不该被忽视。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原有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谁又能保证今天的“语境”不是下一个被抛弃的“老人”呢?

(谭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大理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 杨利慧:《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② 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高丙中认为“学科史上,可能有一个时段是要借助‘轻视’学科传统带来更多的开放,但是有人斗胆开放一段之后,重建对于学科根底的信心的需要和能力都会自然形成。”高丙中:《核心传统与民俗学界的自觉意识》,《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